

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組風潮始末

楊維真

摘要

自民國以來，四川由於地勢阻隔，經常處於一種半獨立的狀態，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難滲入這一邊陲省份。川省雖於北伐完成後亦宣布易幟，納入國民政府政治體制中，但實際上卻依然維持其半獨立之地位。及至1935年國府藉剿共戰事的進展，插足四川，中央與川省的關係開始有了重大變化。前此四川省主席劉湘之所以能擊敗強敵，統一川省，部分實應歸功於中央的支持，故其最初與中央的關係堪稱良好。然自中央勢力進入四川後，逐步打破劉湘獨占之局面，劉湘為維護自己的利益，乃與中央發生各種摩擦。這種形勢在1936年「兩廣事變」、「西安事變」時達到高潮，中央與川省關係日趨緊張。

惟自抗戰爆發後，劉湘在民族大義激勵下，除毅然赴京輸誠，會商抗戰大計外，復積極編組軍隊，並親率川軍出川抗戰，川省與中央關係似有好轉的跡象。然而，隨著國府內遷重慶，四川已成抗戰根據地，中央勢將加緊對川省的控制；加以劉湘突於1938年1月病逝漢口，川中無主，遂貽中央介入川政之機。當時國府有意任命張群入主川政，但此舉遭到四川軍人一致反對，認為劉湘屍骨未寒，蔣就要對四川操刀；乃由川軍各將領通電中央，抵拒張群入川，四川省主席繼任問題迅即成為中央與地方衝突的焦點。本文擬以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組風潮為主軸，探述此一風潮之來龍去脈，並將說明其對當日政局之影響。

關鍵詞：四川、國民政府、劉湘、蔣中正、抗戰

The Recognition of Szechwan Government in 1938

Wei-chen Yang*

Abstract

Szechwan, as a borderline province, had remained semi-independent from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Although it later announced its affiliation to and dependence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never actually lost its independence. It was in 1935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gan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Communists that it began to chang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fact that its governor Lieu Hsiang could defeat the powerful competitor was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support rend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gan to interfere with Lieu Hsiang's administration and get hold of the province, Lieu began to take issu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1936,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orsened as the Lian-Quan Incident and the Si-an Incident took place.

Yet as the Anti-Japanese War started, Lieu Hsian, propelled by great nationalism, volunteered to go Peking to discuss war strategies. Besides, he also organized his own armies and led them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began to soften. However, 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stationed at Chungking, using Szechwan as its base for the War, the province was once agai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n Lieu's sudden death at Hankow in January 1938, nevertheless, enabl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ake over the province without much effor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tended to appoint Chang Chun to take charge of the place, but the proposal was objected by local armies. They urged Generalissimo Chiang not to make any appointment, and resisted Chang's entrance into the province. The appointment of a new governor for Szechwan thus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ial powers.

This paper intends to center around the issue of Szechwan's governmental reorganization, and discuss the upheavals of the time.

Key words: Szechwan,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ieu Hsiang, Chiang Kai-shek, Anti-Japanese War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chen University

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組風潮始末*

楊維真**

壹、前言

在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中，四川由於地勢阻隔，僻處西南，自民國以來經常處於一種半獨立的狀態，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難滲入這一邊陲省分。此不僅塑造了四川獨特的政治格局，也造成民國以來川省主事者特殊的行事風格。四川雖於1928年北伐完成後亦宣布易幟，納入國民政府政治體制中，但實際上卻依然維持其半獨立之地位。及至1935年中央藉剿共戰事的進展，開始插足四川，因之引起四川軍人的疑慮與不滿，中央與川省的關係開始有了重大變化。前此四川省主席劉湘之所以能於1933年擊敗強敵，結束長年的四川內戰，統一川省，部分實應歸功於中央的支持，故最初其與中央的關係堪稱良好。然自中央勢力進入四川後，逐步打破劉湘獨占之局面，劉湘為維護自己的地盤、利益，乃與中央發生各種摩擦。這種形勢在1936年「兩廣事變」、「西安事變」時達到高潮，中央與川省關係日趨緊張。

惟自1937年抗戰爆發後，全國人心激昂，尤其是軍人基於守土有責，紛紛請纓殺敵。劉湘在「共赴國難」的共識下，除於1937年8月毅然赴京輸誠，會商抗戰大計外，返川後復積極編組軍隊，並親率川軍出川抗戰。在民族大義的激勵下，川省與中央關係似有好轉的跡象。然而，隨著國府內遷重慶，四川已成抗戰最重要根據地，中央勢將加緊對川省的控制；加以劉湘突於1938年1月病逝漢口，川中無主，遂貽中央介入川政之機。當時國府有意任命軍事委員會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抗戰時期四川與國民政府的關係（1937-1945）」（計畫編號：NSC89-2411-H-194-022，執行期限：民國88.08.01-89.07.31）成果報告之一部分。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委員長蔣中正的心腹張群入主川政，但此舉遭到四川地方軍人一致反對，認為劉湘屍骨未寒，蔣就要對四川操刀，意圖宰割；乃由川軍各將領通電中央，抵拒張群入川，四川省主席繼任問題迅即成為中央與地方衝突的焦點。本文擬以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組風潮為主軸，論述此一風潮之來龍去脈，除探討中央、地方關係變化的關鍵及國府如何應付此一風潮外，並將說明其對當日中國政局之影響。

貳、抗戰前劉湘與中央之關係

自1916年護國軍興以來，四川即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大小軍人各擁其兵力，分據一方，相互攻伐，遂演為長期內戰之局面。劉湘素有統一四川之大志，經長年努力，終於在1933年9月徹底擊潰對手劉文輝，結束長達年餘的「二劉之戰」，割據紛擾多年的四川始露出統一的曙光。為擊敗強敵劉文輝，歷年來劉湘皆以南京中央為奧援，並在中原大戰、寧粵分裂等重大事件中採擁蔣（中正）態度；而中央亦以劉湘其人在川省軍人中較為廉謹自好，故望其有所成就，¹是以此際劉湘與國府的關係尚稱融洽。惟不久之後，情勢開始有了變化。先是中共徐向前部紅四方面軍於1933年初入據川北，建立「川陝邊區根據地」後，川軍多次進剿皆告失利，川中「匪勢」有日漸坐大之趨勢。「二劉之戰」結束後，劉湘決定全力進剿共軍，除於10月4日宣誓就中央所委「四川勦匪總司令」一職外，並組織六路川軍分頭進剿川北共軍。²孰料川軍於1934年夏秋遭遇慘敗，全線崩潰，劉湘以剿共工作困難重重，乃於是年11月離渝入京，向中樞請示今後四川剿共辦法及善後問題。國府原有意調十師中央軍入川，偕同川軍剿共，但因劉湘不表贊同而打消此意，乃決定另行組織「軍事委

¹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5年1月，臺初版），頁100。

² 周開慶編著、劉航琛審訂：《劉湘先生年譜》（臺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64年10月），民國22年10月4日、5日記事，頁85-86。

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入川協助作戰。³同年12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成立，由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為主任，剋日率團入川。參謀團下設四處，隨該團同來的，還有參謀團政訓處長康澤所領導的別動總隊（共三個支隊，兩千餘人，康澤為少將總隊長）。⁴參謀團的工作範圍甚為廣泛，其目的不外乎將四川政治納入中央體制，並將川軍納入全國統一指揮編制的軍事系統中。⁵如此一來，實無異埋下劉湘與中央衝突之伏筆。

1935年1月，賀國光率參謀團抵重慶，象徵中央力量正式進入四川。賀氏雖為湖北人，但因早歲就讀四川陸軍速成學堂，與劉湘有同窗之誼，私人交情尚佳。⁶然而賀國光卻無法管轄康澤所部別動總隊，問題遂由此而生。康澤係四川安岳人，黃埔三期畢業，後留學蘇聯中山大學，「復興社」創始人之一，乃黃埔系重要骨幹，蔣倚之為股肱；⁷此次率別動總隊回川，頗有打倒殘餘軍閥、取劉湘而代之之圖。別動總隊係於1933年江西剿共時期成立，蔣中正為控制政府軍收復地區（即原中共「蘇區」），原擬組織特務警察隊，以擔任組訓民眾、清剿殘匪及恢復地方秩序的工作。後在復興社留德人員建議下，決定仿德國S.A.（衝鋒隊）成立別動隊，予以新式裝備，以供反共之用，特務警察隊遂改稱為別動總隊，並由康澤任總隊長。⁸別動總隊成員是由黃埔軍校畢業

³ 鄧漢祥：〈劉湘與蔣介石的鈎心鬥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5月），頁57-58。鄧氏久任四川省政府秘書長，親與密笏，為劉湘重要幕僚。

⁴ 鄧漢祥：〈四川省政府及重慶行營成立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6月），頁28。

⁵ 呂實強：〈抗戰前蔣中正先生對四川基地的建設〉，蔣中正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印：《蔣中正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3冊（臺北，民國75年12月），頁273。

⁶ 〈賀國光先生八十自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革命人物誌》，第16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66年6月），頁254-262。

⁷ 李以助：〈我所知道康澤將軍之死〉（代序），刊於康澤：《康澤自述及其下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7年5月），頁4。

⁸ 〈康澤自述〉，康澤：《康澤自述及其下場》，頁57-60。

生及招考高中以上畢業生，施以短期訓練而成；由於康澤的關係，外界多視別動總隊為復興社系統。康澤入川後，首先將別動總隊駐地設於重慶的戰略要地浮圖關，並將一部分別動總隊隊員分配到川軍各軍、師，充任部隊政訓人員。1935年2月四川省府改組，劉湘出任省主席，康澤則兼任四川省保安處政訓室主任，康乃於各專區的區保安司令部內設政訓室，並在各縣設政訓員，這一系統人員亦均由別動總隊隊員充任。⁹由於別動隊員自恃為「天子門生」，氣焰高張，遇事不免操切，所以不久即與川軍發生摩擦；劉湘尤其成為別動隊鬥爭之對象，蓉渝各地甚至出現「打倒軍閥劉湘」的標語，雙方一時劍拔弩張。¹⁰與此同時，康澤則在四川進行一連串的「軍運」、「匪運」、「民運」工作。所謂「軍運」，係指拉攏非劉湘系統的其他川軍領袖，以孤立及挾制劉湘，並收買劉湘的帶兵將領；「匪運」則是收編土匪，拉攏哥老會頭子，製造騷動；至於「民運」則為拉攏川中名流學者，以製造親中央之聲勢。¹¹其中尤以「軍運」進行最為順利，康澤對鄧錫侯、楊森、孫震、李家鈺等其他川軍領袖均派有專人聯絡，鄧、楊等人因恐懼為劉湘所宰割，亦頗願靠攏中央，因此雙方關係堪稱良好。¹²此外，康亦派人暗中拉攏劉湘的軍長王纘緒、唐式遵及師長范紹增、郭勛祺等人，意圖從內部搞垮劉湘。

劉湘對於中央力量入川視若芒刺在背，時感不安；對康澤所為尤為反感，曾公開聲言不願與其會面，¹³並暗中多方防制中央勢力侵入四川。1935年11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成立，駐川參謀團併入行營，由中央軍將領顧祝同為行營主任，賀國光則改任行營參謀長。重慶行營有節制川、滇、黔、康

⁹ 喬誠、楊纘雲：《劉湘》（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10月），頁186-187。

¹⁰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節錄本）（臺北：中國青年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4年10月），頁194。

¹¹ 喬誠：〈星子特訓班鳴炮歡送康澤率參謀團政訓處人員入川〉，刊於康澤：《康澤自述及其下場》附錄，頁412。

¹² 〈康澤自述〉，頁67；喬誠：〈星子特訓班鳴炮歡送康澤率參謀團政訓處人員入川〉，頁413。

¹³ 喬誠：〈星子特訓班鳴炮歡送康澤率參謀團政訓處人員入川〉，頁414。是以康澤在川年餘，始終未得與劉湘晤談。

政軍經之大權，其成立象徵中央勢力更進一步侵入四川，蔣中正並時來重慶親自主持。劉湘為掌握中央情報，除命特務刺探行營情況外，並由電務員截譯行營與蔣往來密電。¹⁴而同年秋蔣中正在四川峨嵋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調訓川、康各軍中、高級軍官，以及中央軍校成都分校的成立，劉湘均將此種舉措視為中央對其軍權之侵奪，其與中央關係漸趨惡化。¹⁵劉湘於是決定採兩面手法，表面敷衍蔣，暗中則加強對中央的防範，命令凡所屬參加峨嵋軍官訓練團的軍事幹部在結訓後，先到重慶廣元壩集訓三個月後方准再回部隊，當時稱之為「褪色訓練」；同時為團結甫系（劉湘字甫澄，故其嫡系號稱「甫系」），乃醞釀成立其核心組織—「武德學友會」，並以對抗復興社的活動為宗旨。¹⁶其後再由武德學友會發展出更核心的組織—「武德勵進會」，該會採嚴密組織，由劉湘自兼會長，軍官入會須經兩名會員介紹並保證，然後經劉湘批准，並填寫誓詞表，舉行宣誓。至1938年初，「武德勵進會」已發展會員八百多人，劉湘「甫系」重要成員幾乎皆在其中，對穩定劉湘所部軍心作用甚大。¹⁷另一方面，則切實聯絡兩廣、雲南及北方各地方實力派，約定有事相互聲援，以防蔣各個擊破。¹⁸是以當1936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時，劉湘以與中央積怨日深，除堅決主張響應兩廣、壯其聲勢外，更出動軍隊準備包圍解決中央軍校成都分校及重慶行營，戰機一觸即發。¹⁹而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劉

¹⁴ 鄧漢祥：〈四川省政府及重慶行營成立的經過〉，頁31。

¹⁵ 謝本書、牛鴻賓：《蔣介石和西南地方實力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頁122。

¹⁶ 〈康澤自述〉，頁76。

¹⁷ 田一平：〈以劉湘為中心的反蔣秘密組織—武德勵進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成都，1985年），頁1-11。西安事變後，武德學友會已成半公開團體，劉湘乃於該會中成立核心組織—「武德勵進會」，其組織及活動均較「武德學友會」嚴密。

¹⁸ 鄧漢祥：〈劉湘與蔣介石的鈞心鬥角〉，頁61；喬誠、楊續雲：《劉湘》，頁192-193。

¹⁹ 鄧漢祥：〈劉湘與蔣介石的鈞心鬥角〉，頁61-62。後因兩廣事變瞬即平息，劉湘只得中止其軍事行動。

湘聞訊頗為興奮，除密電張（學良）、楊（虎城）表示支持、願為後盾外，更有斷然處置蔣中正之激烈主張。²⁰因此，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向國務院的報告中即斷言：在蔣被扣期間，劉湘曾勸告張學良果斷處決蔣介石。²¹職是之故，國府對劉湘之猜忌日甚，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原為行政院副院長，蔣被扣後代理蔣行政院長職務）更認為此事變「其背景與助力，在內為不盡悅服蔣公之疆吏與將領，如山東之韓復榘，廣西之李濟琛，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劉湘，皆可引為同路」。²²國府已將劉湘歸諸如張、楊之流的反蔣地方實力派，其與中央的關係急速惡化。

就蔣中正與劉湘關係而言，迄1936年6月兩廣事變止，蔣對劉湘之態度尚稱溫婉。如同年4月27日，蔣以劉湘患病特電致慰問，電文說道：「中昨以京電催回，故今日由黔飛湘直接回京，不克轉蓉，無任歉仄。貴恙如何？時用繫念，務自珍重，未盡之事請代照拂。如有困難，請兄直接電告，勿稍客氣，中必助兄完成使命也。」²³顯見此際蔣對劉湘仍極事敷衍。及至兩廣事變後，蔣對劉湘之作爲已有疑慮，乃開始預作若干部署。如是年7月21日，蔣中正指示重慶行營參謀長賀國光，對中央軍校成都分校特務團及飛機場（此皆中央所控制）各發無線電臺一架，並派電員以便聯絡。²⁴10月21日，蔣致電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雖表明「對川中謠傳切不可輕信」之態度，督促顧氏「最好兄能赴

²⁰ 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7月，再版），頁34-35。李氏時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秘書兼辦公廳第六科科长，主管情報及新聞發布，親與事變，曾代表張、楊飛太原聯繫閻錫山，並於事變後隨同張學良護送蔣中正回京。

²¹ 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30.

²² 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轉刊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民國72年3月），頁117。

²³ 〈蔣中正電劉湘由黔飛湘回京不克轉蓉並慰病情〉（民國25年4月27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20/4450.01-157，國史館藏（下同）。

²⁴ 〈蔣中正電賀國光發給成都分校特務團與機場無線電台並派電員〉（民國25年7月2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20/4450.01-157。

蓉訪甫澄病，使其安心」，但亦要顧氏詳查貴陽有否儲藏鈔票之洞庫，此實因「無論如何，對外重慶非安全之地，不能不早為之者，但須極秘為要」。²⁵待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落幕後，由於劉湘在事變前後的種種表現，使得蔣中正之疑慮更深，遂決定準備著手處理四川問題，成都的政治空氣亦日趨緊張。1937年1月18日，蔣中正指示漢口農民銀行總經理徐繼莊，將「存渝鈔銀最好陸續極秘密移動，如不便運漢，應密運筑（貴陽），但切勿聲張，或先運存鈔亦可」。²⁶1月28日，蔣電令貴陽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薛岳，嚴防四川與廣西合謀，並調整黔省中央軍配置，派人趕築各地城防工事，以備不時之需。²⁷此外，復指示黔省中央軍逐次向川黔公路北段移駐，以防四川蠢動。²⁸其後雖因陝甘軍事善後可望和平解決，蔣中正以為「川桂無機可乘，其陰謀當可打消」，但由於對川、桂疑慮甚深，故仍要薛岳秘密布置，如期完成各處工事。²⁹而正因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互猜忌、各有心結，是年農曆春節，成都當局甚至禁止民眾燃放爆竹，以免被誤認為中央軍與川軍互相開火而引發不測，足見當日川中形勢之嚴峻。³⁰

1937年2月，康澤奉召至浙江奉化晉見蔣中正，報告處理四川問題。康澤主張徹底解決劉湘，將四川經營成大後方，如此對日戰爭一旦爆發時，方能免

²⁵ 〈蔣中正電顧祝同不信川中謠傳赴蓉訪劉湘病情及查備貴陽藏鈔票庫〉（民國25年10月2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20/4450.01-166。

²⁶ 〈蔣中正電令徐繼莊將現存重慶貴陽現銀及存渝鈔票密運至漢口或至筑〉（民國26年1月1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20/4450.01-171。

²⁷ 〈蔣中正電令薛岳嚴防四川廣西合謀並指示黔南之軍事部署〉（民國26年1月2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20/4450.01-171。

²⁸ 〈蔣中正電薛岳加緊和加強防禦工事的完成及傳師應向川黔公路移防〉（民國26年2月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20/4450.01-172。

²⁹ 〈蔣中正電薛岳我軍在黔勿聲張，並秘密完成各處工事〉（民國26年2月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20/4450.01-172。

³⁰ 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p.131.

除後顧之憂。至於具體的進行步驟則是：先在陝南及川東控制強大兵力，並聯絡鄧錫侯、孫震、劉文輝等川省反劉各軍及王纘緒、范紹增等劉湘嫡系將領；在內外情勢交迫下，然後通知劉湘按中央規定整編軍隊，劉湘如接受則和平解決，如不接受即以軍事力量徹底解決之。³¹蔣大體同意此一方案，乃令康澤及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分頭進行，積極準備，並強調「我們在政治上採取主動，在軍事上被動一點，讓他（指劉湘）先發動」。³²同年3月，蔣致函劉湘說明川軍整軍方案，函文稱：

中央以四川軍民交困，為助兄治川救民之重任，故不得不提整軍方案，期成吾兄之大業。而中與兄公私交切，更不能不竭誠相告，……數年以來，中央本以四川軍民全權托付於兄，始終無間，今後仍本一貫方針，無論軍民各政皆一任兄負責處理，……以全兄治川。以後交政中央之至意，此乃兄入京各代表自始即向京中各方所深切表示者，非僅中一人之私聞也。務望吾兄早日整理川康，以拯民困，用副中央之厚望焉。³³

此函行文軟中帶硬，雖謂四川軍民各政一任劉湘處理，但亦表明川康整軍及交政中央之嚴正立場。1937年4月，軍政部長何應欽代表國府，向劉湘提出川軍整軍計畫，解決川省地方當局之議案正式提上議事日程。劉湘經指派鄧漢祥、劉航琛等人與中央往返協商後，瞭解國府解決川局意志之堅定，以形勢逼人，乃決定讓步妥協；至6月底，雙方大體對川軍縮編的比例達成初步協議，劉湘並同意讓出川東渝（重慶）萬（萬縣）一帶由中央軍駐防。³⁴6月28日，中央發表軍政部長何應欽為「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劉湘（1936年11月四川勦匪總司令部撤銷，劉湘改

³¹ 〈康澤自述〉，頁91。

³² 〈康澤自述〉，頁92。

³³ 〈蔣中正函勉劉湘實施整軍方案整理川康以拯民困〉（民國26年3月），《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20/4450.01-173。

³⁴ 〈康澤自述〉，頁92；另見喬誠、楊續雲：《劉湘》，頁202-208。

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並於12月20日西安事變期間通電就職）為副主任委員，賀國光及川軍將領鄧錫侯、劉文輝等人為委員，川康整軍會議的籌備已進入緊鑼密鼓階段。

1937年7月6日，川康整軍會議於重慶行營禮堂正式開幕，由何應欽親臨主持；然因次日即爆發七七盧溝橋事變，何氏急須遄返南京籌備戰守事宜，會議乃在達成若干協議後，於7月9日草草結束。³⁵至於具體實施步驟，則由顧祝同、劉湘會同各委員進行辦理，這就給了劉湘喘息及居中用權的機會，故當時有「七七事變救了劉湘」一說。³⁶結果在後續的具體整軍步驟中，劉湘獨厚自己的「甫系」。先前整軍會議曾議決川軍各部縮減百分之二十兵力，劉湘直轄部隊原有九十六團，經整軍後縮編為六十團（共有三個軍、兩個獨立師及七個獨立旅），其餘則納入省府保安部隊，改編為二十四個保安團，劉湘仍保有相當之實力。至於其他川軍各部如楊森、劉文輝、鄧錫侯、孫震等，其總兵力合計亦不過僅五十四團，實無法與「甫系」相抗衡，故川中仍呈劉湘獨大之局面。³⁷惟抗戰爆發後，情勢開始有了轉變。

叁、川軍出川抗戰與劉湘病逝漢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何應欽隨即於次日川康整軍會議第二次大會上報告了事件經過，在場許多川軍將領聞訊甚為憤慨，孫震等人更當場請纓，願率所部出川參加對日作戰，抗戰之呼聲已掩蓋整軍議題。整軍會議結束後，劉湘分於7月10日、13日兩電中央，請纓抗戰。在13日的電文中，劉湘說

³⁵ 川康整軍會議達成的協議有：(1)川軍各部縮減十分之二（即20%）；(2)團以上軍官由國民政府有關部委直接委派；(3)川軍軍餉每月由國府軍政部派員點名發放。如此一來，川軍不只縮減兵力，甚至連人事權、財政權皆為中央逐步控制。見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頁467。

³⁶ 馬宣偉：《川軍出川抗戰紀事》（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16。

³⁷ 喬誠、楊續雲：《劉湘》，頁209-210。

道：

此次日人對我挑釁，處心積慮，已非一日。和平果已絕望，除全民抗戰外，別無自存之道。日前在整委會聆悉何部長報告國防準備，仰見鈞座苦心謀國，洞見幾【機】先，袍澤同人，極深興奮。此次敵方藉故侵犯，目光似非局部，鈞座統籌全局，尚祈早決大計。川省雖僻處西陲，……當茲國家生命爭最後呼吸之際，無不敵愾同仇。湘雖行能無似，愛國之心，尚不後人；國家急難相需，豈容稍有諉避？苟蒙驅遣，捐糜奚辭。至若整軍方案，原為充實國力，為抗敵禦侮之計，步驟方法既經決定，尤應積極進行，早竟全功，請釋塵念。³⁸

14日，又通電全國同德一心，共赴國難。³⁹凡此，俱可見劉湘抗敵之熱忱。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以時局已屆最後關頭，乃於7月17日在江西廬山談話會上對事變發表嚴正之聲明，謂「我們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⁴⁰20日，蔣從廬山返抵南京，籌備戰守事宜，並決定召開「國防會議」，邀集各省軍政長官商議共同出兵抗日問題，劉湘亦奉召前往。

1937年8月7日晨，就在舉國一片抗日聲中，劉湘由成都搭機，準備赴京與會。川省各軍及各界代表萬餘人齊聚機場歡送，各界抗敵後援會代表還遞交請願書，請其轉遞中央，表達川省支持政府抗戰之意。臨行前，劉湘向地方人士宣示，「今日之局勢，除抗戰外，別無他途，四川為後防要地，今後長期抗

³⁸ 〈劉湘電蔣中正整軍方案既經決定當積極進行〉（民國26年7月13日），國史館編：《國民政府檔案(二)－國民政府對日情報及意見史料》（上）（臺北：國史館，民國91年10月），頁403-404。

³⁹ 《新新新聞》，成都，民國26年7月15日，轉引自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頁504。

⁴⁰ 蔣中正以時局已屆最後關頭，乃於1937年7月19日晚上將這篇講辭公開發表，以示中國政府之立場。全文見《大公報》，上海，民國26年7月20日，版3。

戰，四川即應負長期支撐之巨責，所有人力、物力，無一不可貢獻國家」。⁴¹當日下午二時，劉湘飛抵南京，又於機場發表談話，重申「決以川康人力、財力貢獻國家」。⁴²8月7日當晚，劉湘參加中樞所召開的「國防會議」，商討和戰大計及對日方針，其經過情形據教育部長王世杰日記記載道：

今日（8月7日）上下午均開國防會議，軍事各部會長官及由外省應召來京之將領閻錫山、白崇禧、余漢謀、何鍵、劉湘等均參加。中央常務委員及行政院各部部長于晚間該會開「大計討論」會議時亦出席。會議決定積極備戰並抗戰；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長相機交涉。⁴³

劉湘在國防會議中慷慨陳詞，除表達支持抗戰之立場，謂「要抗戰才能救亡圖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內」外，更允諾四川可以「出兵三十萬，供給壯丁五百萬和糧食若干萬石」。⁴⁴劉湘此番在京之表現，自是深獲中央嘉許，其與國府關係頗有好轉之跡象。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後，軍事委員會以戰局似有擴大之趨勢，決定以川軍為第二路預備軍，轄兩個縱隊，並任命劉湘為第二路預備軍司令長官，鄧錫侯為副司令長官，擔任平漢鐵路方面的作戰任務。⁴⁵8月14日，劉湘結束在京公幹，束裝返川。抵川後，為謀軍政軍令之統一，並示中央以善意，乃於16日將川康綏靖公署原屬之機場交由重慶行營接管。⁴⁶18日，劉湘約集鄧錫侯、孫震、李家鈺、劉文輝等川軍各派領袖商議川軍出師抗敵問題，決定川軍首批出川抗戰之兵力共十一師，即劉湘直轄唐式遵、潘文華、王纘緒三個軍

⁴¹ 《國民公報》，成都，民國26年8月8日，轉引自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頁504。

⁴² 喬誠、楊纘雲：《劉湘》，頁228。

⁴³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3月），民國26年8月7日記事，頁84-85。由於國防會議係於1937年8月7日召開，故此次會議又稱「八七會議」。

⁴⁴ 鄧漢祥：〈劉湘與蔣介石的鈎心鬥角〉，頁68。

⁴⁵ 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頁505。

⁴⁶ 周開慶編著、劉航琛審訂：《劉湘先生年譜》，民國26年8月16日記事，頁160。

各出兩師，四十五軍鄧錫侯部兩師，四十一軍孫震部兩師，四十七軍李家鈺部一師，各師整裝待發。⁴⁷26日，劉湘以川康綏靖主任名義，發表〈告川康軍民書〉，謂「四川爲國人期望之復興民族根據與戰時後防重地，山川之險要，人口之眾多，物產之豐富，地下無盡鑛藏之足爲戰爭資源，亦爲世界所公認。故在此全國抗戰已經發動時期，四川七千萬人民所應負擔之責任，較其他各省尤爲重大。我各軍將士，應即加緊訓練，礪兵秣馬，奉令即開赴前方，留衛則力固後防。……湘忝主軍民，誓站在國家民族立場，在中央領導之下，爲民族抗戰而效命。」⁴⁸顯見劉湘對中樞抗戰決策熱誠擁護之立場。8月30日，川康綏靖公署開會議決，出川抗敵部隊統限於9月5日以前開拔，劉湘亦決定親率所部出省抗敵，從而揭開川軍出川抗戰之序幕。

按中央原先之部署，劉湘以第二路預備軍司令長官身分將川軍編爲兩縱隊，分兩路出川。鄧錫侯、孫震、李家鈺所部（合計共六師）編爲第一縱隊，鄧、孫二人分爲正、副司令；劉湘直轄唐式遵、潘文華部（合計共五師二獨立旅）爲第二縱隊，唐、潘分任正、副司令。第一縱隊沿川陝公路北上，經西安再東行至河南許昌集結；第二縱隊則沿長江東下，經武漢北行至許昌與第一縱隊會合。⁴⁹1937年10月15日，劉湘奉派爲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長官部指定設於河南鄭州。⁵⁰原第二路預備軍及縱隊撤銷，一縱隊改編爲第二十二集團軍，鄧錫侯、孫震分任正、副總司令；二縱隊改編爲第二十三集團軍，劉湘兼該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則爲副總司令。11月9日，劉湘離蓉經陝飛漢，準備赴京主持第七戰區籌組及出川川軍抗敵事宜。至於四川省政府政務，由秘書長鄧漢祥代行；川康綏靖公署事務，交總參議鍾體道代行；而四川省保安司令一職，

⁴⁷ 周開慶編著、劉航琛審訂：《劉湘先生年譜》，民國26年8月18日記事，頁160。後來李家鈺部決定所屬兩師全部出動，而駐貴州的川軍楊森部兩師、郭汝棟部一師也決定全數開赴前線，故川軍首批出川抗戰共十五個師。

⁴⁸ 周開慶編著、劉航琛審訂：《劉湘先生年譜》，民國26年8月26日記事，頁161。

⁴⁹ 喬誠、楊續雲：《劉湘》，頁231-232。

⁵⁰ 周開慶編著、劉航琛審訂：《劉湘先生年譜》，民國26年10月15日記事，頁164。

則由保安處長王陵基代行，並分別電呈行政院及軍事委員會備查。⁵¹12日，劉湘抵京，抵京後除積極籌設第七戰區外，並在淞滬戰事逆轉、日軍進逼南京之際，向中樞表達願率所部保衛南京之意。⁵²惟不久劉湘即因舊疾復發，且數度瀕於危，以致所願未償。劉湘原先就有胃潰瘍之宿疾，此次入京係帶病離川；抵京後連日奔波，病遂加劇，11月23日胃疾復發，旋陷入昏迷。蔣中正於探視後指示，以京中空襲頻仍，囑速移漢口休養，乃於11月28日抵漢入住萬國醫院治療。⁵³其後病情雖一度好轉，但1938年1月13日又復嘔血昏迷，病勢轉劇。⁵⁴

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主席、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兼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因胃疾復發，於當晚8時病逝漢口萬國醫院，終年四十八歲。彌留之際，猶謂此次奉命出師抗戰，志在躬赴前敵，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今壯志未酬，「惟希我全國軍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繼續抗戰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此志，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返鄉」，仍殷殷以抗戰為念。⁵⁵次（21）日晨，四川省府省務會議以省主席病逝出缺，決定電呈中央，請迅簡賢能，主持省政；在新任未到職前，川省政務決照常盡力維持，藉紓中央西顧之憂。⁵⁶而是日漢口《大公報》亦以〈悼劉主席〉為題發表短評，除肯定近年來劉湘主川治績及川軍出川抗

⁵¹ 周開慶編著、劉航琛審訂：《劉湘先生年譜》，民國26年11月9日記事，頁165。

⁵² 喬誠、楊續雲：《劉湘》，頁233-234。劉湘主動請求擔負保衛南京任務，除表現其愛國之血忱外，收攏其對出川川軍的指揮亦是一大主因。原先劉湘已向中央呈准川軍將集中使用，但川軍出川後，第二十二集團軍即奉軍事委員會命令，撥歸閻錫山第二戰區指揮，投入山西方面戰事；而第二十三集團軍抵漢口時，即奉蔣中正手諭，指撥程潛第一戰區戰鬥序列，旋奉命開往南京以東地區，參加拱衛首都的外圍戰。至此，川軍不僅遭切割使用，且完全脫離劉湘之指揮。

⁵³ 周開慶編著、劉航琛審訂：《劉湘先生年譜》，民國26年11月28日記事，頁166。

⁵⁴ 喬誠、楊續雲：《劉湘》，頁240。1938年1月13日下午，軍政部長何應欽曾來醫院探視劉湘，並交談一小時餘。但在何氏離去後不久，劉湘即吐血昏迷，故外界有劉湘係被中央「嚇死」或「毒死」之說。

⁵⁵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21日，版2。

⁵⁶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22日，版2。

戰之貢獻外，並望中央善選後繼人選，以彌補劉氏逝世之損失。⁵⁷是則劉湘之死，乃揭開中央調整川局之序幕。

肆、蔣中正對川局的規劃與川省風潮

先是，自1935年中央勢力進入四川以來，即因地盤、利益衝突，與四川當局爆發種種摩擦，蔣中正與劉湘之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下。其後雖因中日戰爭爆發，劉湘基於抗敵血忱親率川軍出川抗戰而暫告舒緩，但政府中人對川局始終不能放心。如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長徐永昌即曾在其1938年1月13日日記中，記載蔣氏心腹、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對劉湘的評述：

午間訪岳軍(張群)談關於和戰問題。渠以為既不能戰，即須言和，但敵人條件恐非我們所能堪。且共黨方面、桂軍方面反對必烈；若劉湘之反對，祇他個人之勢力地盤問題。⁵⁸

由此足以顯見劉湘在國府中人之觀感。故蔣中正在得知劉湘死訊後，雖不勝悲悼，以為「甫澄（劉湘）逝世，私情可痛」，然蔣亦慶幸「從此四川得以統一於中央，抗戰基礎穩定，未始非國家之福。」⁵⁹職是之故，蔣乃於1月21日在漢口召集幕僚商議後，決定徹底解決四川地方勢力，調整川省軍政方針，起用張群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並於次（22）日由國府明令公布，此舉對於中央掌控川政實為一大契機。

張群係四川華陽人，自清末留日起，即為蔣中正密友，歷任國府要職，親與密笏。抗戰初期以行政院副院長身分，同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

⁵⁷ 短評一〈悼劉主席〉，《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21日，版2。

⁵⁸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12月），民國27年1月13日記事，頁215。

⁵⁹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1月20日記事，國史館藏（下同）。

會、國防最高會議及軍事委員會三大機構的秘書長，實居於聯繫黨政軍三方面的樞紐地位；加以其與蔣中正的私人交情，使他成為抗戰初期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大員之一。⁶⁰此際中央欲調整四川軍政，不論從哪一方面來看，蔣皆認為張群乃繼掌川政的最佳人選。是以蔣中正於布置妥貼後，乃於1月23日欣然謂：

兩星期以來，自余到汴洛巡視，以至在武昌召集軍官訓話止，其間有極重大之三事：一為拘辦韓復榘，使抗命叛國之徒知所戒懼。二為嚴拒倭寇誘降條件，使倭寇不敢宣戰亦不敢明言絕交，僅言不以我政府為交涉對手以了之。三為劉湘逝世，四川得以完全統一於中央，抗戰基礎大定。此皆足以懾服倭寇，轉危為安之機也。⁶¹

蔣中正之所以如此重視四川政情，實因自1935年入川督導剿共以來，蔣即擬定以四川為日後對日戰爭之大後方。及至抗戰爆發，尤其是1937年11月國府宣言移駐重慶後，四川更成為中國政府領導抗戰之重要根據地。蔣在同年（1937年）11月19日所作的〈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演講中說道：

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當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於如何使國家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但後來終於定下了抗日戰爭的根本計畫。這個根本計畫什麼時候才定下來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訴各位，就是決定於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之時。到川以後，我才覺得我們抗日之戰，一定有辦法。因為對外作戰，首先要有後方根據地。如果沒有像四川那樣地大物博人力眾廣的區域作基礎，那我們對抗暴日，祇能如「一二八」時候將中樞退至洛陽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之前為止，那時候是絕無對日抗戰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進

⁶⁰ 李雲漢：〈張岳軍與抗戰初期之政府決策（1937-1940）〉，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5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82年4月），頁342。

⁶¹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民國27年1月23日記事。

入四川，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戰的後方。⁶²

足見四川對於中國抗戰之重要性。不惟如此，蔣甚且於1938年1月初即對中日戰局做了最壞的打算，設若武漢不幸陷於敵手，則國府將退守川黔；為未雨綢繆，蔣中正稱：「萬一武漢失陷，退守川黔，則國內之變化與倭寇之壓迫，應予顧慮。今欲為持久之際，必先改造川黔，奠定基礎，使內部鞏然無間，則倭終無以脅我也。」⁶³是以為改造川黔計，調整地方省政實為當務之急。先前國府已於1937年冬調實業部長吳鼎昌出掌黔政，以積極建設貴州；此際遂有張群主川之舉，凡此俱為建設後方、持久抗戰之要策。⁶⁴

當時軍政當局對改造川政多抱樂觀態度，除前述蔣中正對劉湘死後川局的評述外，劉湘部留川將領王纘緒等三十五人於1938年1月22日電呈蔣中正，決在中樞領導之下，繼續抗戰到底，⁶⁵亦使中央深覺川局不難堪定。故張群於1月23日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雖表示因職務纏身、交代需時，暫未能入川就職，但仍大談其治川方針，主張培植民力與加緊建設須同時並進，先恢復人民之生產能力，而後次第迅速實現一切國防重要之建設，足見其成竹在胸。⁶⁶而當日輿情對此亦有不錯的反應，頗具影響力的《大公報》於1月24日以〈今後的四川〉為題發表社評，除肯定任命張群主川人選恰當外，並認為今後四川既已成為國家之重心、復興之根據，勢須「打開地方觀念，剷除一切部落思想。要知四川不僅是國家的四川，並且是復興國家的根據地。今後的四川一切建設，皆須針對國家全局，統籌並顧，而不應局限於省的單位。」⁶⁷足見輿論反

⁶² 蔣中正：〈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民國26年11月19日，刊於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10月），第14卷，頁653。

⁶³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民國27年1月2日記事。

⁶⁴ 張群、吳鼎昌皆為國民黨內政治派系—政學系要角，此際分主川、黔，亦難免不使人興政學系擴充地盤之感想。

⁶⁵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23日，版2。

⁶⁶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24日，版2。

⁶⁷ 社評—〈今後的四川〉，《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24日，版2。

應之一斑。職是之故，徐永昌自中央統治角度著眼，乃將劉湘之死視為中國自京滬失守後，國家漸復生機之表徵。徐氏稱：

日前詢蔚文（林蔚，時任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長）對戰事前途之觀察（以其新歸）。渠謂就目前軍隊情形論，祇要敵人不顧一切真來，武漢決難守住，再退後之局面恐愈難維持云。哲民（熊斌，時任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次長）所見亦復如此。（余以為祇要一德一心，西南總可保住，無所謂愈難維持也。且精整軍隊，運用外交，敵人空隙日多，吾人乘其敝以事恢復，非難事。）余謂就近頃事實，如劉甫澄（劉湘）作古等，昭示吾人者，國家似已漸有生機，天不擬亡中國，吾人奈何自亡之？⁶⁸

話雖如此，然則外界有識之士對國府此舉實多憂喜參半，其情誠如教育部長王世杰在其日記中所云：

政府抗戰，將以川省為後方最重要之根據地。然川軍、川政之不良，殆為各省之冠。川軍數量之眾，殆超過日軍常備軍總額（廿五師團約五十萬人），而紀律器械均甚劣。此次川軍參加抗戰者，惟楊森所部略有成績。劉湘所部多不戰而潰。劉氏今日病歿于漢口，政府決定以張岳軍為川省政府主席。一般人對於川省前途，多雜憂慮與希望兩感。⁶⁹

事實上，當此四川與中央尚有隔閡之際，國府未及撫慰川省軍心、人心，即強行發表張群主川命令，作法實有不妥；加之傳聞第七戰區及川康綏靖公署亦將裁撤（第七戰區旋即奉命撤銷），川中人心更為驚慌。如立場較親中央、劉湘死後即奔赴漢口弔謁的四川財政廳長劉航琛，於1938年1月22日在漢口面見張群時，即直言國府此舉之不當。劉氏謂：

聽說你（指張群）已發表為四川省政府主席，不知你是否還有考

⁶⁸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民國27年1月26日記事，頁221。

⁶⁹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民國27年1月22日記事，頁168。

慮的餘地？在個人的見解，應該政府派你去慰問四川所有劉甫澄的部屬和所有官兵，使得他們安心，了解劉甫澄愛護他們，劉甫澄去世後，委員長一樣愛護他們；劉甫澄領導他們，委員長同樣可以領導他們。使他們感到他們的前途，比劉甫澄在的時候，還要遠大一點。讓他的部屬都心安理得，在你慰問他們之後，你那時在成都，漢口這方面發表你為主席，我想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辦法。一切都不管就發表了，我認為這是錯誤。並且聽說裁撤第七戰區和川康綏靖公署，但後方還有一百多團部隊，如果兩者都裁撤了，豈不群龍無首，那是很嚴重的。⁷⁰

劉航琛對時局的看法，以及當日四川軍政人員心理的觀察均頗有見地。果不其然，當中央發布張群主川的消息傳來，立即引起劉湘所部留川軍政人員強烈的反感。

張群雖為川人，但因長期皆在省外工作，與川省軍政界向無淵源；加以此際劉湘屍骨未寒，中央即急於發表張群主川，其宰制四川之意圖甚明。是以張群主川命令發布後，「武德學友會」當即召開緊急會議，並邀省府秘書長鄧漢祥出席，決議團結一致，反對張群主川，要求國府收回成命；同時與鄧錫侯、劉文輝兩部切取聯絡，互為依存。⁷¹1938年1月25日，就在國府發布張群任命的三天後，四川省保安處長王陵基（劉湘出川後即代行保安司令一職，主持川中治安重責）首先通電反對張群主川；次（26）日，劉湘留川的師、旅、團長等，在師長許紹宗領銜下，一反先前擁護中央抗戰到底之態度，亦聯名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濬代呈中央，反對此項任命。⁷²同時武德學友會亦在蓉渝兩地組織群眾，製造反張輿

⁷⁰ 沈雲龍、張朋園、劉鳳翰訪問，張朋園、劉鳳翰記錄：《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6月），頁82。

⁷¹ 喬誠、楊續雲：《劉湘》，頁247。

⁷² 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民國26年至39年）》（臺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61年1月），頁40。

論，大貼標語傳單，廣發代電，以擴大反張聲勢。加以劉湘夫人劉周書1月26日由漢奔喪返川後，又一口咬定劉湘係被中央害死，更激發眾人情緒。⁷³一夕之間，風雲變色，川中形勢立趨緊張。

伍、折衝與風潮的平息

面對四川軍人的反彈，留駐武漢的蔣中正除於1938年1月25日當天下午立即與張群商議對策外，⁷⁴並急召在漢的重慶行營主任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來議，其詳情據顧氏日後回憶道：

我接到重慶行營代主任賀國光於二十一日來電，略以劉湘病故，其文武幹部均分別集會，極顯悲痛惶惑之感；川情複雜，處理極宜周密，請我即便返川一行，俾能有所秉承。當即晉見蔣公請示處理方針，奉指示以川局極關重要，不獨安定川中人事，督令川軍整編出川，參加抗戰，尤須對政治、軍事、經濟，妥為設計部署，期使四川成為我長期抗戰的後方基地。⁷⁵

在蔣氏面授機宜下，顧祝同迅於25日當日偕劉湘親信將領潘文華⁷⁶飛抵重慶，坐鎮指揮，並連日會晤留川各將領，商議具體處理方案，以調處川局。1月27日，重慶行營副主任賀國光更奉命率同潘文華、劉湘嫡系將領王纘緒、許紹宗、重慶市長李宏錕及重慶警備司令李根固等人由渝飛蓉，與成都的軍政要員及各軍代表數度會商。賀氏抵蓉後發表談話，謂劉故主席（湘）所志未完，責

⁷³ 喬誠、楊纘雲：《劉湘》，頁244。

⁷⁴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1月25日記事。

⁷⁵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0年12月），頁176。

⁷⁶ 潘文華係四川人，劉湘嫡系出身，為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二十三軍軍長，因1937年底皖南廣德戰役敗績，遭撤職查辦，甫由前線返抵漢口。今因川局紛擾，蔣中正手令恢復其職權，並命其偕顧祝同返川調處。

在繼起，此來係「宣達中央處理川局善後意旨，對甫公（劉湘）部隊中央當特加愛護，以為確定原則」；⁷⁷同時並約王陵基晤談甚久，期能化解川中紛擾。為解決川局，蔣中正除對川中將領釋放善意外，亦有意委潘文華、王纘緒為集團軍總司令，許紹宗、郭勳祺等人為軍長；⁷⁸準備將劉湘舊部爭取過來，以拆王陵基的臺。另一方面，蔣則於27日致電顧祝同，指示處置川事注意事項。電文曰：

川事聞有人民陣線分子在內鼓動，此等分子不顧大局，比共黨尤為險惡，務令王、潘諸將領從速設法，根本肅清，以除後患。對激烈軍人，應特別注意，並善為開導，勿使受愚。各師、旅、團長若服從中央命令，不受反動派蠱惑，則必負責保障其地位。至於范紹增軍長，可囑其自動暫辭，以免發生枝節；俟風潮平伏後，仍可再委，何如盼復。⁷⁹

是晚，軍事當局舉行會報，蔣稱為「川事費盡心力」，⁸⁰至晚十一時始入睡，足見川局應付之困難。

經一夜長考，蔣中正決定「對川方針以和緩為主」，乃於1938年1月28日特發長電慰勉川中諸將領。其電文曰：

疊接諸兄及在川各將領來電，一致表示繼承甫澄主任遺志，擁護中央，鏖（戮）力抗戰，忠義篤至，深用佩慰。川省為抗日之國防根據地，甫澄主任數年來擁護中央，完成統一，苦心所寄，唯在整理軍政、發展地方，以增厚國家對外之力量。此次率師抗戰，倍著忠勤，積勞辭世，舉國痛悼。觀其病中籌策，不忘國防建設，臨歿遺言，曾

⁷⁷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29日，版2。

⁷⁸ 沈雲龍、張朋園、劉鳳翰訪問，張朋園、劉鳳翰記錄：《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頁82-83。

⁷⁹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1月27日記事。

⁸⁰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1月27日記事。

無一語及私，實足資袍澤之表率，興後死之觀感。中央籌措川事善後，自必一秉至公至正之方針，審酌國家與地方之需要，並顧兼籌，以期裨益抗戰全局，而安慰甫澄主任與戰死袍澤之英靈。……須知中央重視川政，固無不籌維悉當，而中正對我全川父老袍澤及與甫澄主任多年患難相依之關係，於公於私，尤不能使一事一人之不得其所。甫澄之僚友，即中之僚友；甫澄之部屬，即中之部屬，愛護之誠，罔間始終。諸凡措置，必以對國對川對逝者對生者，均無遺憾為前提。一方面使川省對國家克盡偉大之貢獻，同時亦必保障才能，登用賢俊，俾成有效力之機體；即機關或有更張，而人員必為安頓。只要服從命令，遵守甫澄遺囑，則決不令甫澄所部有一人之失所，而無所依托也。務望我全川軍政長官曉諭部屬，一致體念中央愛護之苦心，與甫澄主任公忠體國之遺志，安心服務，努力工作，勿惑於謠言，勿懈其素（夙）志，一心一德，以大義為依歸，豈惟川省之幸，抗戰前途，實所利賴。⁸¹

基本上，此封長電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前述劉航琛解決川局之意見，除勉勵川省軍政人員安心服務、努力工作外，並保證中央必保障才能、登用賢俊，對四川緊張之氣氛應有相當緩和之作用。同日，《大公報》以〈再論川事〉為題，二度發表社評，呼籲川中人士放眼於國家全局，打開地方觀念，一致擁護政府，頗收以輿論與政令相呼應之功效。⁸²不惟如此，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更於次（29）日在重慶國府大禮堂召見渝市紳、商、農、工、教育、新聞各界代表，「為國府歷年來未有之創舉」，⁸³在在揭示國府處理川局之用心。惟川中形勢雖有緩和之趨勢，然劉湘留川部隊旅長彭煥章等人仍於1月29日聯名電呈

⁸¹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1月28日記事。另見《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30日，版2。

⁸² 社評一〈再論川事〉，《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28日，版2。

⁸³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1月30日，版2。

蔣中正並通電全國，請中央收回張群主川之成命，重新考量接任人選，四川政局仍暗潮洶湧。⁸⁴是以徐永昌於1938年2月1日晤見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時，魏氏仍聲稱「岳軍（張群）到任尙有待，以川中反對者頗有人也」，⁸⁵顯見問題之嚴重性。

爲有效解決川省軍人之反彈，蔣中正決定雙管齊下，除由重慶行營正、副主任顧祝同、賀國光分與川軍各將領斡旋外，復派員直接爭取川軍少壯派軍官，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如前第二十三集團軍參謀長周從化⁸⁶即奉密命，於1938年2月8日遄赴成都，向川軍將校進行宣導，其經過情形據2月13日周氏電呈蔣中正稱：

生齊日（8日）抵蓉，已向各方宣導，惟部隊受惑甚深，而野心者奢望甚大，現正計謀有效方法，以期消除對方險惡陰謀。俟具體方案籌畫妥當，再行電呈，並由甘秉常同學來漢面稟請示。⁸⁷

蔣對於周從化的工作極爲重視，特復電指示進行步驟曰：「元申電悉，至慰。望將中（正）對我青年袍澤愛護之精誠，與革命經過之事實，愷切宣導，甘秉常同志到時當予延見。」⁸⁸蔣中正對川事之處理可謂殫精竭慮、費盡心力，曾

⁸⁴ 〈抗戰八年成都紀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成都，1985年9月），頁15。

⁸⁵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民國27年2月1日記事，頁224。

⁸⁶ 周從化，四川新繁人，合川軍官講習所（劉湘所辦）畢業，歷任劉湘所部連、營、團長及第二十一軍軍部參謀。1933年入陸軍大學，其與中央關係或於此時建立。陸大畢業後任劉湘川康綏靖公署參謀處長，開始參與劉湘機要，乃劉氏心腹之一。抗戰軍興後，隨劉湘出川抗戰，原為第七戰區長官部參謀處長，1937年底派任第二十三集團軍參謀長，全權代表劉湘（時劉湘臥病在漢）督促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唐式遵反攻蕪湖。1938年1月，唐式遵升任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同月劉湘病逝後，周氏遭唐免職回川。喬誠、楊續雲：《劉湘》，頁239、294-295。

⁸⁷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18日記事。

⁸⁸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18日記事。

自述「日來心境鬱結，內憂甚於外患，且時起消極之念」；⁸⁹2月20日弔楊永泰墓時，感念時艱，更謂「若暢卿（楊永泰字）尚在，則必多補益也」，⁹⁰此實不為無因。

另一方面，由於此次反彈之四川軍人多屬劉湘嫡系—即所謂「甫系」人馬，是以如何運用川軍其他派系以收制衡「甫系」之效，亦是蔣中正苦心思索之道。環顧當時川省軍界，非屬劉湘嫡系、而與劉氏輩分相當且又有一定實力者，當首推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為平衡四川軍政生態，在經多日長考及與部屬商議後，蔣決定調鄧氏回川主持軍務，乃於1938年2月12日以國府令派任鄧錫侯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副主任，並電約鄧氏來漢晤談。⁹¹2月24日，蔣中正在漢接見鄧錫侯，徵詢其對川局之意見。鄧氏以為川局紊亂主要係由劉湘舊部（即所謂「甫系」）引起，若能對劉部主要人物王陵基、王纘緒、潘文華等表示倚重，畀以重任，使其心安，並將其留川部隊編成若干集團軍交彼等統率指揮，如此既可充實前線兵力，又復滿足其政治要求，川局即不難堪定。同時鄧氏亦建議保留「川康綏靖公署」，協助省府動員四川人力物力，徵兵徵糧支援前方，並可統馭留川部隊鞏固後防。俟局面穩定之後，再由張群出主川政，當能得到各方支持。⁹²蔣中正對鄧錫侯所見頗表贊同，決定採納其意見，並認為「政治方面，四川風潮已可平息，無須心急」，⁹³足見其已成竹在胸。3月2日，國府發表鄧錫侯為川康綏靖主任；翌日，鄧氏由漢口經

⁸⁹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18日記事。

⁹⁰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20日記事。

⁹¹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12日、15日記事。

⁹² 陳仕俊：〈鄧錫侯出川抗戰和安定後方的點滴見聞〉，《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成都，1985年9月），頁70。

⁹³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28日記事。

渝飛蓉，進行疏通工作，賀國光另由重慶登機同行，紛擾的川局至是露出一線曙光。

與此同時，蔣中正在籌謀川事之餘，亦不能不對此次風潮之核心一王陵基稍事假借，以彌合中央與地方關係，遂藉王氏協力安定川局為由，於1938年2月13日電勉之，其電文曰：

此次甫澄適在後方部署就緒，率師趨赴前方抗戰之頃，不幸病發逝世，國家失此柱石，中正失此股肱，悲悼之深，激於心腑。想念其未竟志事，無一非上為國家，下為人民，如何持續努力，而有以發揚光大之，此實為中（正）對於甫澄部屬最殷切之盼望也，中（正）之情切愛護，可以想知。不謂道途迢阻，消息隔膜，奸小乘隙，故造謠言，淆亂事實，致甫澄部屬之在川中者，或於中央委屈顧到各方之處置，稍有一二誤解之點。頃據（劉）航琛、（盧）作孚為言，至賴吾兄體察群情，曲為解譬，維護地方秩序，不使任何枝節發生，尤以努力但為人群，一己絕無所取，純潔精神殊為吾黨老同志增色，令中（正）佩慰。據言張君斯可（再）、鄧君鳴階（漢祥）皆為斡旋糾紛有力之人，至盼商同兩君，協助子晉（唐式遵）、仲三（潘文華）、治易（王纘緒）三集團總司令，將各集團部隊迅速編配完成，以安軍心。念兄前線擔任指揮，具有長才；後方擔任治安，卓有成績。在此國家迍邐之日，借重彌殷，至盼最近即有面談機會，並望斯可（張再，川康綏靖公署參贊）、鳴階（鄧漢祥）二兄中，能先來一位，詳敘一切，請兄與墨三（顧祝同）切取聯絡，中（正）亦已電墨三知照矣。⁹⁴

王氏係川軍中之元老派，曾任清末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教官，劉湘、楊森等川軍將領多出其門下，劉湘生前對王氏常執弟子禮，其在軍界中資格甚老。王

⁹⁴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13日記事。

陵基又為武德學友會監事長及武德勵進會代會長，加以劉湘離川前，曾命王氏以保安處長身分代理川省保安司令職，掌握二十餘團保安團，不論就資歷、威望或實力，王氏皆自認其乃繼劉湘後主川之不二人選。是以當中央發表張群主川後，首先起而反對者即為王陵基。惟王氏亦有其弱點，由於其資格老，在軍中常倚老賣老，目無餘子，故其於川軍中人望不高。王陵基原以為川省主席及綏靖主任二職為其囊中之物，垂手可得，孰料武德學友會中頗有反對之人。王氏以內未獲武德學友會支持，恐外招亂川首禍之名，其態度漸趨保守。今得蔣之溫言慰藉，當然使王陵基頗為受用，乃於2月22日派綏署參贊張再飛漢，代表綏、省二署晉謁蔣中正，報告川省政情。⁹⁵張再抵漢後，經與中樞多日磋商、代達川情後，大致已有解決之腹案。故26日川省民政廳長嵇祖佑由漢飛返成都，向王陵基、鄧漢祥等報告赴漢商承川事結果；而張再則在漢口發表談話，以使各界明瞭川情，張再說道：

這次劉司令長官……突然逝世，是國家重大不幸，而因劉司令長官之逝世，中央對於善後處置尚未確定之際，敵偽便造出種種虛構的宣傳，國人視聽亦不免受相當的搖惑，以為中央與地方間有如何的隔閡，其實這都是過慮，而且是背於真相的。……自從抗戰發動以後，（四川）一切更稟承中央意旨，然不幸劉司令長官逝世，在川省軍民方面，鑒於過去的情形，於公眾的願望，想稍留寬裕時間，以作陳述的機會，這是政治上通常的行動，並且稍有所見，即坦率上陳，也是忠誠的表示。……現在就是仰望中央體察軍民的願望，簡選深明川情物望所歸的大員來分主軍民重務。藉可鞏固後防，增強抗戰力量，因為川政已久入常軌，川軍亦深明大義，決不會於此嚴重時期，稍有削弱抗戰力量，這是可以負責聲明的。⁹⁶

從張再的談話中足見中央與川省已商得妥協方案，此即由國府簡選「深明

⁹⁵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2月23日，版2。

⁹⁶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2月27日，版2。

川情、物歸所望」之人主川，而「川軍亦深明大義，決不會於此嚴重時期，稍有削弱抗戰力量」之舉。所謂「深明川情」，此即排除省外人士；而「物歸所望」，則使王陵基深明己身處境，此後即淡出川中之競逐。是以鄧錫侯於1938年3月初返川調停時，其進行過程就要順利多了。未幾，鄧錫侯即與「甫系」將領商定，推薦王纘緒繼主川政、潘文華則為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雙方皆大歡喜；而中央亦對「甫系」將領釋放善意，王纘緒、潘文華、王陵基陸續奉委集團軍總司令。4月26日，行政院會議決議：(一)派王纘緒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二)任命潘文華為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⁹⁷同日，蔣中正為川中人事安排，電知雲南省主席龍雲，電文稱：「四川省府主席擬派王纘緒代理，各方皆甚融洽，並任潘文華為綏靖副主任，王陵基為集團軍總司令，劉文輝為重慶行營副主任。如此，四川內部當可穩定」。⁹⁸至此，滿天陰霾，一時散去。

川省風潮之所以得以漸次平息，除去中央的斡旋與妥協外，川省父老的態度亦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前四川省長張瀾即曾於1938年4月5日，在成都《新民報》以〈應該從速決定的兩件事〉為題，力言當前川省之重大病症，一為省府財政瀕於破產，二為各地匪患乘機復起。而其解決之道，在財政方面，張氏稱：「川省財政的破產，除了獲得中央財政的救濟外，決不易恢復原狀。要想獲得中央財政的救濟，則任省主席的人，必須與中央有密切關係，而又是在中央有力量的人，始能運用中央財政的助力，來復活四川將死的財政。」⁹⁹至於川省土匪的復起，其原因則在於政局動盪，一時綱紀廢弛，因而地方治安無法維持；故「今天要維持地方的秩序，就必先整飭川省的紀綱，要紀綱能夠整飭，就必須顧全中央的威信，蓋必中央有堅強的威信，而後能整飭川省的紀

⁹⁷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4月26日記事。

⁹⁸ 〈蔣中正電龍雲派王纘緒潘文華王陵基劉文輝等職以使四川內部穩定〉（民國27年4月26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檔》，檔號：2010.30/4450.01-011。

⁹⁹ 張瀾：〈應該從速決定的兩件事〉（1938年4月5日），《張瀾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頁120-121。

綱，此點十分重要。」¹⁰⁰最後，張瀾復大聲疾呼：

總之，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從速出師抗戰，立功於國家，才是川中軍人的光榮。在保持中央的威信大原則下，催促省主席早日來川主持，使川事不致日趨於敗壞，才是川中人民福利。這兩件事，都是應該從速決定，如其再拖延下去，就難免不誤國誤川。¹⁰¹

張瀾自晚清參與四川保路運動始，歷任川北宣慰使、國會眾議院議員、川北護國軍政務長、川省嘉陵道道尹、四川省長及成都大學校長等要職，並積極投身四川教育及社會文化等事業，是川省重要的耆老，其言論、立場當然對四川民眾具有極大的影響，對於「誤國誤川」如此嚴厲之指責，川省軍人自不能不有所顧忌。

此外，當日輿論之反應或亦是風潮平息的另一主因。如先前《大公報》曾於1938年1月24日、28日兩論川事，後因川中風潮似有蔓延之趨勢，乃於2月5日再次發表社評—〈三論川事〉，要求「四川軍政界，希望嚴重認識國家民族的需要，及自己的責任。……國家復興，需要四川者甚大，全川同胞，第一要時刻考慮自己雙肩上這一個嚴重的擔負」，¹⁰²表達媒體對川事的憂慮與期望。2月19日，《大公報》再藉日機空襲之機，以〈空戰大捷與重慶受襲〉為題發表社評，呼籲「現時留川而未赴前線的師旅團長們，及政治上有資望的士紳們，必須確切認識大局，認識自己責任。我們要救亡，只有戰鬥，而戰鬥是國家統一的行動，必須無地域見，無派系見，全民族集中團結於國家統一的軍令之下，纔能戰鬥，纔能救亡。……所以在川軍官，必須繼劉主席遺志，擁護政府之軍令政令，趕緊推動川省一切工作。」¹⁰³當日極具影響力的《大公報》在川省風潮中連續發表四篇社評，不僅表現媒體針砭時政之責任，亦代表民眾極

¹⁰⁰ 張瀾：〈應該從速決定的兩件事〉，頁121。

¹⁰¹ 張瀾：〈應該從速決定的兩件事〉，頁121。

¹⁰² 社評—〈三論川事〉，《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2月5日，版2。

¹⁰³ 社評—〈空戰大捷與重慶受襲〉，《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2月19日，版2。

大的想望，其對風潮之平息當有一定的影響。

陸、結語

由於歷史上長期相對獨立及地理的阻隔，四川省民之性格常與其他省區有較大的差異。蔣中正重要幕僚、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的陳布雷，即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及其與川人的接觸經驗，陳氏稱：

川人之穎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沉著質樸之士，殊不多覯，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致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勝於質，志大而氣狹。¹⁰⁴

此雖為陳布雷一隅之見，但其對於川省軍人之評價實不為無因。四川由於長年的內戰，軍人之間習於縱橫捭闔、爾虞我詐，遂至各逞機鋒，而未能相見以誠。兼且因長期相對獨立，川人對省外事務多不甚措意，對省外勢力入川則異常敏感，凡此皆為1938年四川省府改組風潮重要之內在因素。王世杰亦曾對此提出其看法，王氏說道：

四川、雲南諸省，以與外界交通多隔絕，地方人之地方觀念甚深。中央政府與各地機關西遷後，此種地方觀念之繼續存在，頗為一切設施之障礙。未知歷時稍久，能使之消除否？¹⁰⁵

究其實，自1935年中央軍入川以來，中央與四川當局的摩擦與衝突即告不斷；此情勢至1936年西安事變後到達高潮，中央乃有解決劉湘或裁編川軍之意，並於川康整軍計畫中逐步實行。其後雖因抗戰爆發，在民族大義激勵下，劉湘奉命率川軍奔赴前線，其與中央關係似有好轉之跡象。但自國府內遷重慶，四川已成爲中國抗戰之大後方，在當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下，全國人力、物力皆須整合到中央來，以因應軍事之所需，四川自不能例

¹⁰⁴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頁99-100。

¹⁰⁵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民國27年8月14日記事，頁334-335。

外。而劉湘恰於此際病逝漢口，遂貽中央調整川政之機。

四川軍人對於張群主川反應之激烈，實出乎蔣中正意料之外；其主因除前述川人之獨特性格外，中央在劉湘過世後未及撫慰川省軍民，亦未曾徵詢四川軍政界意見，即行發表張群主川並裁撤第七戰區，其作法太過操切，川中風潮實其來有自。足見中央在處理與地方關係上，宜謹慎將事。事實上，蔣中正正在處理川省風潮過程中可謂費盡心力，除派員斡旋、電勉慰藉以消弭川軍反對意見外，亦運用內部分化、權力平衡及利益拉攏等諸般手段，加以配合輿論及川中父老之壓力，終使風潮得以平息，事件和平落幕，總算有個不錯的結局。其中經過，誠如蔣中正於1938年4月28日復王纘緒電文中所稱：「此次決定川中軍政人選，實幾經考慮，不惟公私兼顧，亦情理兩全，以此為最相宜。」¹⁰⁶

此次川省風潮之解決，中央與地方皆各退一步，看似各有所得。如王陵基雖未得任省主席，但升任集團軍總司令亦聊堪告慰，且其與中央關係反有更進一步之發展；王纘緒原與中央即有往來，今得出長川政，其與中央關係更為緊密；鄧錫侯出任川康綏署主任，除可平衡川軍生態外，亦可裁抑「甫系」之發展。至於中央則在風潮平息後，將王纘緒、潘文華、王陵基所部三集團軍皆調省外參與抗戰，不僅充實了抗戰兵力，且川中「甫系」部隊幾已抽調一空；如此一來，不啻是對川軍國家化及川政中央化埋下重要之伏筆。然而，在整個事件處理過程中，由於中央事先未能妥善規劃、謹慎安排，以致激起強大反對聲浪，遂不得不與地方尋求妥協；此不僅損及國府領導權威，亦埋下四川軍人對中央離心之伏筆，其對日後形勢影響甚大。

¹⁰⁶ 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7年4月28日記事。

徵引書目

(一) 檔案、史料彙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圖書文物·事略稿本〉，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

2010.20-4450.01-157，166，171，172，173，〈籌筆檔·統一時期〉。

2010.30-4450.01-011，〈籌筆檔·抗戰時期〉。

國史館編，《國民政府檔案（二）—國民政府對日情報及意見史料》（上）。

臺北：國史館，民國91年10月。

(二) 報紙、大事記

《大公報》，上海，民國26年。

《大公報》，漢口，民國27年。

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民國26年至39年）》。臺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61年1月。

(三) 專書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3月。

匡珊吉、楊光彥主編，《四川軍閥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

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7月，再版。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節錄本）。臺北：中國青年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4年10月。

沈雲龍、張朋園、劉鳳翰訪問，張朋園、劉鳳翰記錄，《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6月。

周開慶編著、劉航琛審訂，《劉湘先生年譜》。臺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64年10月。

馬宣偉，《川軍出川抗戰紀事》。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12月。

康澤，《康澤自述及其下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7年5月。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5年1月。

喬誠、楊續雲，《劉湘》。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10月。

謝本書、牛鴻賓，《蔣介石和西南地方實力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0年12月。

(四) 專文

田一平，〈以劉湘為中心的反蔣秘密組織—武德勵進會〉，《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成都，1985年。

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72年3月。

李雲漢，〈張岳軍與抗戰初期之政府決策（1937-1940）〉，《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5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82年4月。

呂實強，〈抗戰前蔣中正先生對四川基地的建設〉，《蔣中正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3冊。臺北：蔣中正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民國75年12月。

〈抗戰八年成都紀事〉，《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成都，1985年9月。

陳仕俊，〈鄧錫侯出川抗戰和安定後方的點滴見聞〉，《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成都，1985年9月。

張瀾，〈應該從速決定的兩件事〉，《張瀾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

〈賀國光先生八十自述〉，《革命人物誌》，第16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66年6月。

蔣中正，〈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4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10月。

鄧漢祥，〈四川省政府及重慶行營成立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6月。

鄧漢祥，〈劉湘與蔣介石的鉤心鬥角〉，《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5月。

(五) 外文資料

Kapp, Robert A.,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